长征途中的“第一等好事”

■余海玉

军史回眸

古人云：“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翻阅红军长征亲历者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史料，有个细节让人动容：万里征途中，许多红军将领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都保持着读书的习惯，甚至在生死悬于一线时，仍读书求索。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更是这支军队、这个政党历经磨难，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深层密码。

书挑子里藏乾坤

跟随毛泽东同志走上长征路的警卫员陈昌奉清楚记得，长征出发时“主席的全部行装是：两条毯子，一个洋布被单，一块油布，一把破伞和一个书挑子”。这个“书挑子”里的书籍，伴随毛泽东一路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全程亲历长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根据她的讲述，毛泽东在一路转战中仍然坚持读的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后文称《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文称《“左派”幼稚病》）等书。

实际上，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已经读过这两本书。在苏区时，毛泽东把《两种策略》寄给彭德怀，上面还用铅笔写着一段话，大意为：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后，毛泽东又寄给彭德怀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在书上写：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与彭德怀分享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毛泽东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1964年，毛泽东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自己“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长征途中阅读的书籍，很多是红军1932年打下福建漳州时搜集而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还有他非常喜爱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这本书带给毛泽东诸多启发。《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的书，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3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杜林论》中文版的译者吴黎平回忆，1932年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主动和他讨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还评价他翻译得好。在长征行军中，毛泽东丢弃了好些衣物，但这本书却一直带在身边。吴黎平回忆，“记得在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我把这本书带过来了。’”可见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喜爱和重视。

长征途中读书，不是脱离现实的闲情逸致，而是毛泽东立足斗争实际、研判局势的重要方式。依托对这些经典书籍的学习和思考，毛泽东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他用读到的理论思考路线问题，为决策提供思想武器。

保护古籍留美名

走上长征路时，徐特立已经57岁，是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老兵”。这位受毛泽东尊敬的老师，对书籍的热爱近乎痴迷。

红军过遵义的见证者、遵义地下党员周济，回忆过徐特立在遵义时的一个细节：徐老的身体不好，正在“打摆子”（害疟疾），他身上揣着治病的“奎宁”，还有一本《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与恩格斯》；看一阵书，又吞两颗药。

据另一位见证者、遵义当时进步文化团体“红军之友社”成员之一的余选华回忆，在遵义时，徐特立托他找到《遵义府志》，了解遵义地区的风土人情，称赞编著者很有学问。后来，徐特立又去老城拜访遵义书法家王石珊，见几名年轻战士正烧书取暖。一向温和的徐特立十分生气，当即制止并耐心教育了他们。为了保存好遵义的珍贵文化典籍，徐特立让大家先到革命委员会打封条，把藏书封存起来，然后再集中放到《续遵义府志》的撰写人赵乃康先生家中，请其代为保管。赵乃康深受感动，写下《呈徐老》：“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随后，徐特立向红军总政治部建议加强对红军战士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从此，红军长征的路途中出现了醒目的保护书籍和文物的标语。根据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等人考证，红军二进遵义时，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曾居住过的房间里，刷了一条“保卫书籍 不要乱拿”的竖版标语。虽然标语字迹不太工整，却见证了红军重视文化、保护书籍的往事。

在遵义期间，徐特立还和余选华来到位于遵义老城的通俗图书馆。徐特立在楼上发现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明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历史书，相当于《二十四史》中的志书总结。徐特立见了，如获至宝，兴奋地说：“毛主席正在找《三通》。”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徐特立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交流过读书心得，并且一路都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徐特立除了自己读书，一路上还坚持不懈教红军战士识字。不少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红军战士，跟着徐特立一路行军学习，识字读写能力稳步提升。这位“长征老青年”，一边坚持自学求索，一边倾尽心力传播文化火种，用一言一行告诉身边战友，越是艰苦，越要学习求真、积蓄力量。

日记之中满书影

长征途中，陈伯钧在3个方面军都任过职，曾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这种情况下，陈伯钧始终保持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书求知、坚持记日记的习惯。

1935年8月初进驻两河口后，陈伯钧记录12日“看《两种策略》一书”，13日依然看这本书，14日“午后，看完列宁所著《两种策略》一书”。

陈伯钧的长征日记中，随处可见有关读书和写作的记录。一路上他读了刘伯承著的骑兵战术书籍、德译本《战术讲义录》以及《特种战斗》《武装暴动》等书。他还将所学知识进行整理，给战士讲课。1936年4月至6月驻瞻化期间，陈伯钧为教导队讲授了《对敌人骑兵的战斗》《排担任侦察》。他还在日记中提到自己起草修改《步兵动作》《侦探勤务》《简易的设计动作》《西北敌情》《行军宿营》等书册，好多天都是忙到很晚才结束。

1936年9月，陈伯钧在夜行军中，因坐骑受惊摔了下来，头部和手部受伤，但读书的习惯不改。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读《唯物史观》第二章，《有定论与无定论》全部。”9月9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提到：“看完《唯物史观》第三章，《辩证唯物论》的全部。”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陈伯钧，利用长征中的零碎时间坚持阅读军事书籍和哲学理论，并不断总结运用或编撰军事著作。这为他后续指挥作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勤学星火耀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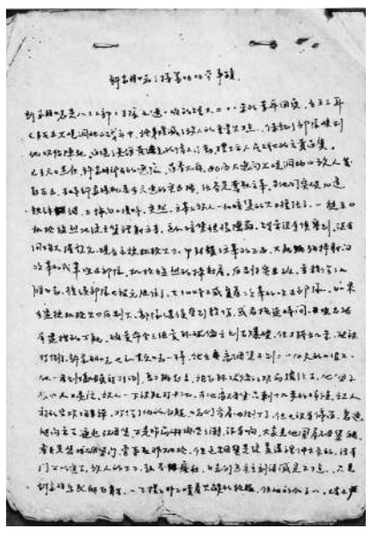
长征途中读书好学之风遍布全军，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留下了勤学事迹的记载。“长征四老”之一的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勤务员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任弼时一路上带着两个铁皮箱的书，自己拄着拐杖步行，让马驮着书。刘伯承行军途中坚持研读俄文军事著作。邓小平长征期间曾主编《红星报》，转战间隙坚持编审稿件、研读时政理论……他们勤学苦读的星火，如一束束光，照亮前进的征程。

许多老红军回忆，沿途经过书店时，书籍、报刊、文具被红军官兵争相借阅购置，读物迅速一空，直观印证了长征中全军高涨的学习热情。许多普通红军战士，白天浴血奋战、阻击敌人，夜晚围坐篝火旁听读报、学识字、悟道理，从目不识丁的贫苦子弟，成长为有信仰、懂文化、明初心的革命战士。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革命的探索，像一种看似无形却重若千钧的力量，支撑着这支队伍历经千难万险而从不言弃。

红军官兵读书学习，为的是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担架上研马列、徐特立奔走护古籍、陈伯钧病中读书忙的鲜活身影，连同万千红军战士篝火求学、路边识字的动人画面，共同铸就了长征路上“越是艰险越向学”的红色丰碑。

许家朋：像黄继光一样去战斗

■洪继奎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许家朋荣立特等功的事迹报告，记录了许家朋1953年7月在石岘洞北山战斗中的详细事迹。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图文军史馆

73年前的7月6日，志愿军战士许家朋壮烈牺牲。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张早已泛黄的信纸。斑驳的字迹，记录着这位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31年，许家朋出生在安徽省绩溪县勰头村一个贫苦农家。年少时，他为地主放牛，饱尝艰辛。当他看到同样衣衫单薄却舍生忘死保卫乡亲的新四军战士时，一颗种子在幼小的心灵悄然埋下：长大后也要加入这支人民的队伍。

1951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全国掀起参军热潮。期盼已久的许家朋毫不犹豫地奔赴绩溪县城报名，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一年，他刚满20岁。临行前，父亲紧握许家朋的手叮嘱道：“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就没有咱们的好日子。到了战场上，别给党和部队丢脸，多杀敌人！”父亲的教诲，成了许家朋此后军旅生涯的座右铭。

一年后，许家朋所在连队改编为志愿军第23军67师200团3营9连。同年9月，部队奉命入朝。初入朝鲜，望着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和颠沛流离的朝鲜群众，许家朋的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请大人不要挂念我，我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战斗、生活都很好。我向你们保证：一天不把敌人彻底消灭，我决不回祖国！我要争取立功，为父母争光，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1952年10月，在上甘岭战役中，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的壮举传遍全军。许家朋得知后，内心受到了强烈震撼。他找到入团介绍人陈广芝，坚定地说：“我也要接受战斗的考验，像黄继光一样勇敢地消灭敌人！”

1953年7月，为密切配合板门店停战谈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许家朋所在连队受领了反击石岘洞北山战斗任务。任务下达后，全连上下群情激昂。许家朋所在的9连2班配属6连担任突击任务，他主动向团支部递交决心书：“这次战斗我有信心、有决心完成任务，为祖国、为毛主席争光。在战斗中我保证英勇顽强，在万一的情况下，我要像英雄黄继光一样，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战斗的胜利！”在庄严的出征动员宣誓大会上，许家朋立下铮铮誓言，并在鲜红的战旗上重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7月6日晚，大雨滂沱。9连配合6连向石岘洞北山发起进攻。突击排如尖刀般直插主峰，连续突破敌人3道铁丝网，胜利在望。然而，就在部队逼近主峰时，敌军暗堡突然喷出毒蛇般的火舌。冲锋的战士们接连倒下，部队的攻势被死死压制。

“排长，让我来！”危急时刻，爆破手孙伦球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却不幸在途中中弹牺牲。雨夜如墨，敌人的机枪仍在咆哮。如果不迅速拔除这个钉子，待到敌人反击，部队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伏在距暗堡20多米处山坡上的许家朋，此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不等排长下令，他迅速匍匐至孙伦球遗体旁，抓起炸药包，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顶爬去。

10米、9米、8米……战友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突然，一发炮弹在许家朋身旁炸开。他身负重伤，双腿血流如注，几乎昏厥。希望的火苗，仿佛一下子被浇灭。

“快看！许家朋还活着！”借着闪电和火光的映照，战友们惊愕地发现，许家朋凭着惊人的意志，夹着炸药包爬行。3米、2米、1米……许家朋终于爬到了暗堡脚下。他颤抖着安放好炸药包，拉开导火索，翻滚到一旁。然而，期待中的巨响并未传来——炸药包因雨水浸泡受潮而失效。

雷声滚滚，电光闪闪。看着仍在狂啸的机枪，以及阵地上焦急无助的战友，在这一刻，许家朋作出了和黄继光同样的选择。

他猛然挺身起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向射击孔，双手死死抓住机枪脚架，用自己年轻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他的身上，22岁的生命就此定格，化作永恒。

“同志们，为家朋报仇，杀！”看到这一幕，战友们悲愤交加，呐喊着发起冲锋，以摧枯拉朽之势夺下北山顶峰。在随后5天5夜的战斗中，我军歼敌3500余人。许多幸存的老兵回忆起那晚的战斗，总是哽咽着说：“多亏了许家朋同志啊！那天黑夜，要不是他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眼，部队怎么能上得去！”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许家朋“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追记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战友们称赞他是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为铭记许家朋的光辉事迹，1957年，绩溪县人民政府将许家朋的家乡更名为“家朋乡”。如今，矗立着许家朋烈士纪念碑的绩溪烈士陵园，成为安徽省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许多瞻仰者从全国各地而来，在碑前驻足追思。

“跨战马，别亲人，许家朋，志刚强。英雄穿上绿军装，满腔热血对人民，火红战旗鲜血染，英雄生命永长青……”英雄从未远去，家朋乡孩子们的朗读声在山间回荡。他的精神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生生不息。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红色足迹

『遥望玉龙舒鳞甲』

■向贤彪

长江，从青藏高原南下，流入横断山脉，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忽然被峭壁的山崖拦阻，猛地调头，折向东北，在这里形成一个平缓的冲积河谷，人称“万里长江第一湾”。

这段大江，叫金沙江。江边有一个石鼓镇，依偎于半月似的江湾。水浪激溅的渡口，高耸着一座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毛泽东同志题写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9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镌刻于碑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纪念碑旁，立有一尊“红军渡江雕塑”，刻有“金沙水暖”字样的基座上，立着一位红军战士和一位船工的雕像。他们目光对视，双手握在一起，一如在怒涛的吼声中奋然前行……

立于纪念碑和雕塑前，望着眼前水波逐流的江面，听着岸边传来的阵阵松涛，我的脑海里不觉浮现出当年红2、红6军团夜渡金沙江的情景。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在甩开尾追之敌后，兵分两路，日夜兼程西进，以破竹之势横扫滇西。当月下旬，他们到达金沙江边的石鼓镇。

石鼓镇是金沙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江对岸，悬崖陡壁，山峦重重。渡口上，有敌人重兵把守，隐约可见的座座碉堡前，布满密集的铁丝网。敌人妄图以严密的戒备，把红军阻拦在金沙江南岸，以便就地歼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上级的作战命令极为简洁，又极为严厉：“过去金沙江是活路，过不去是死路！”这14个铿锵的字眼，重重地敲击在红军官兵的心上——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英勇无畏的红军。从湘西出发，我们一路高擎理想的火炬，所向披靡，势不可挡，难道还会被眼前的一条江所阻挡吗？

在暗夜的掩护下，红军官兵立下了决死渡江的誓言，也悄然完成了渡江的周密部署。

入夜，由前卫师组成的三支突击队，摸黑来到江边，开始实施渡江计划。第一突击队300多人，任务是消灭碉堡的敌人；第二突击队700多人，任务是夺取渡船；第三突击队包括船工共600多人，任务是架浮桥。突击队人员都是水性娴熟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一支短枪，七八个手榴弹。

一切都按作战计划有序进行着。担负渡江先遣队任务的官兵，因没有找到过江的船只，许多人只能泅渡前进。当时虽然是春天，但在深夜里，江水依然寒冷刺骨。不少人在长途跋涉中，身上都留有伤疤，被冷水一浸，痛得难以忍受，但没有一个人退却。大家相互照应着，奋力向对岸游去。

在第一突击队中，有一位姓李的战士，年仅17岁，身体瘦弱，加上连续急行军十分疲劳。连长将小李拉到自己的身边，扶住他的肩膀，一同向对岸游去。游到江中心时，遇到一个很大的漩涡，小李被卷进去。恰在这时，北岸的敌人又密集地向江中一阵扫射，小李的头部受伤。连长和另外一位战士见状，紧紧地抓住快要沉没的小李，拼命向岸边游去……上岸后，小李无力地倒在地上。连长唤他，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小李已经牺牲了。连长藏好小李的遗体，带领大家迅速向敌人的碉堡匍匐前进，用一声声端掉敌人碉堡的巨响，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第一突击队上岸后，冲进敌人的碉堡。敌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成了俘虏。当第二、第三突击队相继渡江后，按照作战计划，有的追击逃窜敌人，有的找来船只和门板，用绳子把船只拴起来，再紧紧系在岸边的岩石上。当次日的太阳驱散江面的浓雾之时，一座用生命与鲜血架起的浮桥，已巍然横跨在金沙江的激流之上。紧跟着，大部队的渡江开始了。人们记住了这一天——1936年4月25日。

船桨在江面上飞快地摇动，满载着红军官兵的船只破浪疾驶。红军的重机枪、迫击炮等由木船或木筏运过江，伤病员从浮桥上通过，还有的随骡马泅渡。渡江之际，岸边还有隐蔽的敌人在阻击，空中还有敌机投弹轰炸，有的船被炸翻，有的战士和船工被炸死炸伤，鲜血染红了滚滚江水……但敌人的阻击没有迟滞红军将士渡江的坚定脚步。就这样，横亡在征途上的又一个天险，被英勇的红军所征服。4天3夜，18000多名官兵胜利过江。长长的江岸上，军民们奔走相告，到处洋溢着报捷的欢腾。从此，在当地百姓中留下了“贺龙敲石鼓，红旗漫天舞”的民谣。

4月28日，朱德总司令在接到贺龙等人发来的“两军团本日已安全渡过金沙江北岸”的电报后，十分惊喜，随即复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渡江成功后，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的萧克，望着流淌的江水和岸边欢腾的人群，吟出了《北渡金沙江》：“盘江三月燧烽飏，铁马西驰调敌忙。炮火横飞普渡水，红旗直指金沙江。后闻金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遥望玉龙舒鳞甲，会师康藏向北方。”诗词热情讴歌了英勇的红军官兵和踊跃支前的人民群众，折射出将军诗人的浪漫情怀。

踏过万里山川，红二方面军犹如玉龙一般。龙鳞飞卷，龙身腾跃，好不威武雄壮、气势如虹！红军官兵脚穿草鞋、身披征尘，在烽火中闯关夺隘、一路向北，完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夹金山下，我面向党旗宣誓

■邹 衍

亲历者讲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长征。时年19岁的我在红军总政治部任通讯班长，经常往返于总部与中央领导之间，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一次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当时，作为一名有4年团龄的共青团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5年6月，我随红军强渡大渡河，来到了夹金山下。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粮食奇缺。先头部队传来消息，有的部队因准备不足，好多体弱的战士在山上被冻死了，因此通知大家要做好准备工作。我将时任总政秘书长的肖向荣送予的一件夹衣拆下来，找了一些破碎羊毛等物，在蔡畅大姐的帮助下，准备缝制棉衣。当天下午，我们的支部书记刘群宣同志通知我，晚上要召开支部会，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一直在盼望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在晚上的支部会上，刘书记做完爬雪山的思想动员后，动情地说：“鉴于邹衍同志的思想成熟程度和工作表现，组织考虑将该同志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请大家举手表决。”当时参加会议的11名同志一致表决通过，而后刘书记带领我面向党旗进行了宣誓。会议结束后，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了，要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我不由得浑身是劲。当时在山脚下时，天气还很热，大家走得浑身是汗。但走到半山腰突然觉得天气变凉了，太阳也被云彩遮得时有时无，再往上走就变得更冷了。这时，空中一片浮云飞来，大风突然吹起，立刻大雪纷飞，顿时四周一望无垠，全是皑皑白雪，呼吸也感到越发困难，腿脚也开始发软，一步步挪动十分艰难。有的战士休息一下再走，结果就再没有起来。我心中一遍又一遍默念着入党誓词，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过这座大雪山……

文章摘编自《红色血脉》（解放军出版社）第一卷——“深情颂伟业，永远跟党走”主题征文作品集，有删节。